

汉字

和文化问题

汉字与文化丛书



周有光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汉字

和文化问题

汉字与文化丛书

★周有光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字和文化问题/周有光著.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1

(汉字与文化丛书)

ISBN 7-205-04469-3

I. 汉… II. 周… III. 汉字-文化 IV. 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9316 号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158 千字 印张: 9 1/4 插页: 2

印数: 3,001—6,000 册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富娟 吴长勇

责任校对: 吴广军

封面设计: 赵多良 刘冰宇

版式设计: 王珏菲

插图: 金姗姗

定价: 20.80 元



《汉字与文化丛书》总序

在本丛书即将付梓的时候，我们想谈谈对汉字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以及对汉字文化学学科建设问题的初步思考。汉字与文化这一课题刚刚起步，很多问题还在讨论而无定论，本丛书的目的既然是希望吸引更多的同道来关注这一课题、参与这一学科的建设工作。那么，谈谈我们的初步思考，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就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何况，经过十年的实践，在汉字文化学这个研究领域里，也有一些原则的问题，已经在大多数人中产生了共识，结论日趋明朗。为了新学科的健康发展，使有些问题在前一阶段讨论的基础上有所推进。所以，我们想在这里对一些具体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建立汉字文化学的事实基础是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汉字与文化究竟有些什么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出什么样的规律？怎样去探求这些规律？解决这些问题，是建立汉字文化学的前提。

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古代和近、现代都有人作过一些研究，但从来没有成为系统之学、专门之学。将汉字与“文化”连在一起而且冠以“学”的名称并明确表示要作为专门学科来建设，至今还不到十年历史。十年间，不但在一些汉字学和文化学、文化史的论著中，常有部分内容涉及这一课题，在一些文字考据的工作中，汉字与文化关系的意识也时时呈现；而且，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论著日渐增多。这些成果，拓宽了汉字学的研究领域，为汉字文化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十载经营，这门学科已显示了自己的生命力。它的成就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重新评价汉字。从19世纪末开始，汉字一直处在受批评的地位。从“汉字落后”进而发展到要“废除汉字”。中国也要走拼音文字的道路，似乎已成定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重新反思汉字的优越性，才不再盲目附和，并进而打破了舆论一律的僵化局面；同时，也否定了以往把汉字改革生硬地纳入社会改革、政治革命轨道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只有在这样的形势下，汉字文化学的研究才有可能；汉字文化学的及时提出，又为发展这

种大好形势起了推动作用。

第二，揭示汉字本身蕴藏着的丰富的文化信息。目前已出版的汉字文化学著作无不注意发掘个体汉字所包含的文化信息。曹先擢最早出版的《字里乾坤》就是对汉字蕴涵的文化信息进行分析的；何九盈等主编的《汉字文化大观》分上下两编，下编是分析汉字本身的文化信息的，刘志基的《汉字文化综论》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为“文化蕴涵考”，其内容都是分门别类探索挖掘具体汉字的文化内涵的；刘志诚的《汉字与华夏文化》，其目的也是“从汉字形体结构证明华夏史前文化”（张世禄语）。该书五、六、七章的标题都是“古文字形体——华夏史前文化的投影”，乃全书重点所在。1935年陈寅恪给沈兼士的信说：“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202页）。从考古学的观点来看，汉字的确具有“文字生物学”的价值，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古人留在龟甲、牛骨、陶器、青铜、简帛等载体上的“活化石”，利用这些“活化石”考察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其可信程度不亚于另外一些出土文物，甚至高于其他的文物。众多的汉字文化研究工作者，一起步就在“文字生物学”方面下功夫，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三，提出了许多边缘性质的问题，将汉字研究引进前人很少涉足的宏观世界，突现了汉字与汉

人、汉民族、汉文化、汉文化圈的种种深层关系。如汉字与意识形态、汉字与思维方式、汉字与汉语及其方言、汉字与原始文化、汉字与境内少数民族境外的其他民族的关系……

这些问题，一般的汉字学是很少能顾及到的。只有顺时而生应运而起的汉字文化学才能将这类问题集合在一起，放在统一的框架之中，分门别类进行研究。

既然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如此密切，汉字文化学的建立就是势所必然的了。这样，为汉字文化学定位的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我们认为，为汉字文化学定位，要考虑到下面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一门新的学科所以诞生，因为它是时代的需要，是科学发展的必然。既然是一种需要，一种发展的必然，它的诞生必然会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以及本学科的知识积累过程。

“汉字文化学”的远背景要追溯到本世纪初兴起的“以字考史”、“说文证史”的潮流，近背景为80年代出现的“文化热”，特别是文化语言学的中国潮促使一些研究汉字的学人由文化观潮一变而为文化弄潮儿。前一背景以汉字作为研究古代历史和古代社会的工具，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是以地下出土的甲骨文与文献资料互证，程树德的《说文稽古篇》是以小篆考证古人的生活习俗。这些研究都具有文化研究的性质，却不能称之为“汉字文化

学”，应属于汉字学的范围；至于“文化语言学”（或称语言文化学），它是由语言学分出来的边缘学科，研究的重点只是语言跟文化的关系，也还不是汉字文化学。但是，这远近两方面的研究，无疑属于汉字文化学产生的背景，是汉字文化学产生的重要推动力。

其次，一门学科所以能成为独立的学科，它必然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研究的内容和任务。什么是汉字文化学研究的内容和任务呢？

何九盈等主编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以下简称《大观》）在《前言·汉字文化简论》中明确指出：“汉字文化学是一门以汉字为核心的多边缘交叉学科。尽管研究工作还有待于深入，但这门学科的总任务已非常明确。一是阐明汉字作为一个符号系统、信息系统，它自身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二是探讨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就是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正因为总任务是如此，所以《大观》“对汉字的历史和特征，对以汉字为载体的辉煌文明，对汉字的研究和教学，有较系统的介绍、论述”。“是要展示汉字文化的方方面面”。仅仅看这几句纲领性的说明，就能感到，这一类关于汉字文化的界定，外延相当广大，内容相当丰富。从《大观》所论述的内容来看也的确如此，如“汉字的起源”、“汉字形体的演变”、“汉字的书写工具与载体”、“汉字的特点”、

“汉字的规范、注音和简化”、“汉字的研究与应用”、“汉字与汉民族文化”、“汉字与汉语及兄弟民族文字”、“汉字与文学艺术”、“汉字与年号、姓氏、避讳”、“汉字与意识形态、思维方式”、“汉字与兵、法、吏”、“汉字与衣食住行”、“汉字与经济活动”、“汉字与动物、植物”、“汉字在海外”（以上均为该书标题）。

王宁在《说文解字与汉字学》的第一章中对汉字文化学的内容和任务作了如下的概括：“这种研究（按：指汉字文化学的研究）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从文化的角度看汉字，用文化的眼光来观察汉字、解释汉字。例如，对汉字构形依层次两两拼合的格局形成的文化原因的探讨；对汉字构形模式形成的文化原因的探讨；对汉字各种书体产生和成熟的历史社会背景的探讨等等。总之，是把汉字视为一项在文化巨系统中的文化项，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互促、互抑因而能互证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对汉字在构形中所携带的文化信息的分析，这种分析既有对个体字符的分析，又有对总体系统的分析。”

赵诚在《汉字文化探索》一文中对汉字文化学的研究内容进一步论述说：“汉字是汉语的书写符号，汉语是汉文化信息的载体，而汉文化又包括各种类型的文化。因此，汉字与汉语、汉字与汉文化的各类型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多种形式的关

联，研究汉字文化必须注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涉及这些联系和关联。如果丝毫不涉及，则汉字文化的研究将是不完整的……虽然汉字与汉字文化息息相关，但是，汉字并不等于汉字文化，而汉字文化又是汉文化下属的各种类型文化中的一种，如果汉字文化蕴涵的研究过多地涉及汉文化的各类型文化，则汉字文化的内容有可能不适宜地膨胀；另外，汉字不等于汉语、汉字文化不等于汉字，汉字文化也不等于汉语文化，如果汉字文化学不恰当地兼容了汉字学、汉语语言学（包括汉语的语法学、音韵学、词义学、修辞学等等）和语言文化学的内容，则汉字文化学将会显得相当庞杂。”

以上三种论述，前一种更开放一些，后两种则更严格一些。但是，它们有两点是共同的：第一，汉字文化学具有多边缘交叉的性质，但是，它的研究内容和任务不论涉及多么广泛，都是以汉字为核心的，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为限制的。第二，汉字文化学的内容有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宏观的，是把汉字也看成是一个文化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微观的，是把汉字字符及其系统作为文化的载体，来探讨它所载负的文化信息。本丛书五位学术委员对汉字文化学的内容和任务都有自己不同的论述，这些论述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完全一致，但以上两个方面，可以说是他们的共识，因而这两点，可以看做本丛书讨论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再次，创建一门新的学科，不仅要有这一学科下值得研究的内容，而且必须为这门新学科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说，确定这门学科在现代科学体系里处在哪一个层次上，属于哪一个领域，和哪些其他学科为邻。

汉字文化学是属于汉字学的分支呢，还是属于语言文化学的分支呢，目前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何九盈等在《简论汉字文化学》中已谈到：汉字文化学是从汉字学“这大树分蘖出来的新枝”。王宁在《说文解字与汉字学》中把汉字学已有的分支划分为四个方面，也就是四个分学科，即：汉字构形学、汉字形义学、汉字字源与字用学和汉字文化学。这也就是说，汉字文化学是汉字学的一个分支；而另一种意见认为“汉字文化研究可以认为是中国语言文化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我们认为汉字文化学应当属于汉字学的一个分支，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

第一，决定学科地位的主要依据是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汉字文化学既然以汉字作为研究对象，而且要以汉字的形体结构作为重要依据，它自然应是汉字学的分支。当然，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没有汉语也就谈不上汉字，但是，汉字与汉语在本质上不是同一的关系。汉字的发展演变除在一些方面受到汉语的推动外，也还有不受汉语支配的自身发展规律。汉字是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的符号系统，因

而，汉字的文化内涵不等于汉语的文化内涵。汉字学与汉语语言学既不是同一的学科，彼此也没有从属关系。语言文化学与汉字文化学也不应该有从属关系。

第二，何况，什么叫“文化语言学”，又是一个难题。在我们看来，现在国内所说的文化语言学，只不过是汉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研究，它是汉语研究的一个分支，并不能包括或代替整个汉语研究，更无法涵盖汉字文化学的内容。汉字文化学与汉语文化语言学，二者是平行中又有交叉的关系。

第三，汉字是汉民族的文字，而又超出了汉民族，国内不同语言的少数民族有汉字式的文字，东亚又有不止一个国家使用过或仍在使用着汉字。法国汪德迈的《新汉文化圈》说：“这一文化区域所表现出的内聚力一直十分强大，并有其鲜明的特点。它既不同于印度教、伊斯兰教各国，内聚力来自宗教的力量；又不同于拉丁语系或盎格鲁-撒克逊语系各国，由共同的母语派生出各国的民族语言。这一区域的共同文化根基源自萌生于中国而通用于四邻的汉字。”东亚有一个汉字区域，并没有一个汉语区域，这一点也可以证明，文化语言学不能涵盖汉字文化学。

汉字文化学的研究显然不能满足现状。迄今为止，众所公认的、成熟的理论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许多基础性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如：

什么是“汉字文化学”，汉字文化学的学科定位，汉字文化学的范围，汉字文化学的意义，都还有讨论的必要。这些问题一时不能形成统一的意见也没有关系。“文化”一词是什么涵义，国内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这并不妨碍大家对“文化”一词的广泛使用，也丝毫不妨碍“文化热”的出现。同理，你可以不同意我们对“汉字文化学”的说法，甚至还可以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汉字文化学”。这也无妨，或许还能从对立相反的方向刺激促进这门学科的发展。

根据汉字文化学基本内容的界定，在这一领域里，有大量可作的题目，有的已经有人作过，有的还无人问津。即使那些已经作过的题目，也没有过时，可作的文章还很多。所谓理论、方法，也只有通过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才有可能抽象化、系统化。真正能起指导作用的理论恐怕也只有那么几条，几句话，一些不着边际的模糊含混的高论不可能有什么威力。

一种学科的研究形成热潮，本来应当是这一学科的幸福；但是，“热”有时也会带来“滥”。在汉字文化研究的热潮中，我们也注意到了有一些信口开河或耸人听闻的说法。有的人为了表现对汉字的“热爱”，把汉字的作用夸大到“比一切文字都优越”，借此来否定拼音文字，甚至要把汉字强加给全世界；有的人打着“维护汉字文化”的旗号，不

顾汉字发展的历史事实，违背汉字构形的基本规律，随意联想，乱讲汉字，扰乱汉字的科学传播与教育；有的人缺乏汉字的基础知识，对前人的研究成果，看也没有看懂就胡乱批评，甚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还有一些神话般的说法，据报纸报道，有人能“辨识出六千年前西安半坡 30 个文字符号”，“发现甲骨文中的‘黄’、‘帝’二字就是由西安半坡的数字符号组成的，同时还证明确实存在仓颉这个人，分析出甲骨文中有许多字是仓颉造出来的”。这就神了，仓颉其人或许“确实存在”过，但这些做法和说法，我们都是不赞成的。我们认为，汉字文化必须建立在汉字科学的基础上，不能违背汉字的发展规律，也不能违背文化的发展规律。汉字文化是科学，不是幻想，更不是个人无根据的联想和猜测。

在热潮中更需要保持冷静，现在是呼吁保证质量的时候了，质量只能建筑在深度与广度这两个基础之上。为了提高质量，以下问题似乎应当引起重视：

第一，关于汉字形体结构的分析是研究汉字文化底蕴的主要依据，而同一形体结构究竟如何分析，表示什么样的文化涵义，必须有充分的文献和文物材料为证据，还必须具有正确的考据逻辑，使考据符合字理、语理和事理。考据虽然是对一个或数个单独的汉字，但必须考虑到汉字的构形系统，

不能讲了一个字，扰乱了一批字。现在有些讲汉字文化的书，随意性比较大，甚至乱讲语音通假以证实一己私见，或者望文生训，以今律古。所以，对字形的解构，一定要严谨，对构形不明的字不要强作解人，这是确保质量的首要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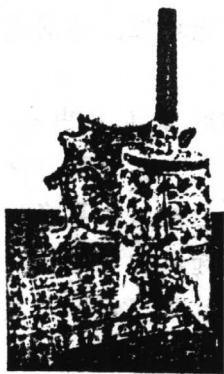
第二，要充分重视汉字文化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点。为此，研究者本人就应当根据课题需要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我们现在从事汉字文化研究的成员主要来自语言文字工作者，不可能同时精通研究汉字文化可能涉及的人类学、考古学、文化学、神话学、哲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知识结构的局限毋庸讳言。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必须吸引上述多学科的人才来组成研究的学科群；另一方面，作为个体研究者，也应力求开阔视野，正视课题与知识结构之间的矛盾，这是提高研究质量的又一保证。

第三，汉字文化研究要切忌发空论。宏观的汉字文化研究与微观的汉字文化研究是互相印证的，起码是不能相悖的；因此，第一手材料的充分发掘和利用就显得十分重要。我们要用新眼光、新理论，重新审视史料，从中发掘出有价值有意义的汉字文化证据，这是提高研究质量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学之兴废在人”。21世纪将会出现一些能集大成的汉字文化研究的专门人才，他们是汉字文化学的希望。我们现在来编写这套《汉字与文化丛

书》，是抛砖引玉，是为一代新人作铺垫。我们既相信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又知道自己的工作仅仅是一个开端。在这套丛书即将陆续付梓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一研究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响应、参与、批评都是关注，并热切地企盼斯学的发展有一个更加美好的前程。

《汉字与文化丛书》学术委员会



选编者的话

丛书的学术委员会为这套书定了一个选题：现代汉字与现代文化。确定作者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周老，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

周老早年专攻经济学，是一位经济学家。但对汉字情有独钟，执着追求中国的语文现代化。从1937年起发表语言文字学论文，1955年正式“下海”，改行研究汉字学和语文现代化。跟研究传统汉字学不同，周老站在世界文字史的高度，密切联系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趋势，用经济学家的精密眼光和精细方法，深入研讨现代汉字，出版了《汉字改革概论》、《拼音化问题》、《中国语文的现代化》、《新语文的建设》、《中国语文纵横谈》、《世界文字发展史》等十几种专著，发表了300多篇论文，其